

# 金克木的观星岁月

黄海海

金克木有一样极强的能力，凡有所学，立刻便能放入行中巩固和检验。在《如是我问——访金克木教授》中，他自陈学外语的经验：“要用什么，就学什么，用得着就会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拣起来”。虽然他自己说，“学外语不能照我这样，还是得走正道用功”，其实这种在实行中学习的方式，非常富有成效。迷上天文学以后，金克木一边开始阅读天文学（尤其是星座）方面的书，一边也就开始观星。

《天上人间——谈天第一信》里，金克木写到了他开始观星的种种困难：“我仗了先生画的那张图，就认识了将近十座。但图上西边星座早已归隐，东边星座尚缺甚多，眼见就不敷用了，只好再到北大图书馆去找，结果呢，据说天文书都装了箱子，剩的几本已经是破铜烂铁的好伴侣了。……然而我还是有了认星的机会，终于从一位朋友处弄来了一本顾元编的天文学，又到西城市立图书馆去查了两次沈编星宿图，断断续续看了些夜，也马马虎虎认识一些星座了。”顾元编的，应是作为高中教科书的《天文学》，初版于1930年3月。沈编星宿图未知何指，但从行文来看，应该跟顾元的书类似，是入门指导性或便于初学查找对照的基础读物。

度过了初期的困难，金克木很快便从观星获得了振拔的力量：“那是在一个深夜，心情颇为不佳，所以电灯已熄还不肯睡。买了支蜡烛来，在黯淡的光中，同室的一位朋友伏案写文，我便看顾书的星图。看一座便到院里去看，找不清楚再进屋来看图，那时夜已很深，我国认为室宿和壁宿的飞鸟已升至天顶，一座庞大的正方形带着两个小三角形，顶上接着一连三颗亮星的公主，再向东北联上大将，遥映御夫主星，配上仙后座，真足称奇观。尤以四周黯黯，惟一室有烛光摇曳，星座乃愈显其光彩。诗云‘子兴视夜，明星有烂’，不在这种环境中观星的恐未必能看出烂然来吧？”

《观星谈》主要记的，是等待狮子座流星雨的事。“约计看到狮子座时已过半夜，如果一人守候，则如此凄清的冬夜，恐怕不能坚持到底。不料望星也能成为传染病，竟有朋友愿意陪我守夜。”虽然那年流星雨误了期，没能看成，但金克木显然对此印象深刻。写于1998年的《忆昔流星雨》，便旧事重提，“两人通宵不睡，除看星外干什么，他又提议，翻译那本世界语注解世界语的字典，可以断断续续，与观星互不妨碍”。经过岁月的推排销蚀，这记忆没有漫漶模糊，越发变得晶莹透彻：“我花几个铜圆买了一包‘半空’花生带去。他在生火取暖的煤球炉上，开水壶旁，放了从房东借来的小锅，问我，猜猜锅里是什

么，我猜不着。他说，是珍珠。我不信，揭开锅盖一看，真是一粒粒圆的，白的，像豆子样的粮食。我明白了，是马援从交趾带回来的意苡，被人诬告说是珍珠，以后就有了用‘苡苡明珠’暗示诬告的典故，所以他说珍珠。他是从中药店里买来的，是为观星时消夜用的。看流星雨，辩论翻译，吃‘半空’和苡苡明珠，真是这两个刚到二十二岁的青年人的好福气。”

这个一起等待流星雨的朋友，金克木称为“喻君”，1980年代初还曾在上海为他找到过《答望舒》，但我没有考出其真实姓名。热衷观星的这段时间，除了喻君，还有几个朋友曾经参与。“朋友沈仲章拿来小望远镜陪我到北海公园观星，时间长了，公园关门。我们直到第二天清早才出来，看了一夜星。”（《译匠天缘》）“织女星在八倍望远镜中呈现为蓝宝石般的光点，好看极了。那时空气清澈，正是初秋。斜月一弯，银河灿烂，不知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天上。”（《遗德》）《记一颗人世流星——侯硕之》中，则记下了他们俩的观星体验：“为观星，我选的是一个前大半夜无月的日子。记得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观察造父变星。真凑巧，赶上了它变化，看着它暗下去了。后来，七姊妹结成昴星团上来了。我们争着看谁能先分辨出仙女座星云。那是肉眼能看到的唯一的银河系外星云。我们坐在地上，在灿烂的北天星空下，谈南天的星座，盼望有一天能见到光辉的北落师门星和南极老人星。”

在这个过程中，金克木开始陆续阅读西方通俗天文学作品。“那时中文通俗天文书只有陈遵妫的一本。我借到了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书一看，真没想到科学家会写那么好的文章，不难懂，引人入胜。”后来经朋友鼓励，或许也是意识到了国内通俗天文读物的不足，金克木便开始翻译这类作品。“译科学书不需要文采，何况还有学物理的沈君（核仲章）和学英文的曾君帮忙。于是我译出了秦斯的《流转的星辰》。沈君看了看，改了几个字，托人带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请陈遵妫先生看。”（《译匠天缘》）后来译稿经曹未风卖出，得稿费二百元，“胆子忽然大了，想以译书为业了”。觉得一年译两本这样的书，就抵得上全年天天上班的收入，因此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辞职（实际是不告而别），赴杭州译书。

赴杭途中，金克木经过南京，便去拜访陈遵妫。“陈先生对我很热情，不但介绍我去天文台参观大望远镜，还要介绍我加入中国天文学会。我说自己毫无根基，只是爱好者。他说，爱好者也能翻译天文学书普及天文知识也够资格。我隐隐觉到天文学界的寂寞和天文学会的冷落，便填表入会。”（《天文·人文》）这次拜访中，正好张哲哲在陈家，就也一起见到了。值得一提的，是金克木后来跟天文学会的关系。1952年秋，中国天文学会重新登记会员并整顿改组，金克木参加了会议。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拍卖文件，是金克木1956年填写的“中国天文

学会会员调查表”，备注注：“本人拟申请退会。本人以前曾爱好天文学，翻译过‘通俗天文学’‘流转的星辰’。但近年来已不再从事天文学，现在工作也与天文无关。是否仍保留会籍，抑退会，请组织上考虑。”这退会申请最后是否通过，不得而知。

在外飘荡了一百多天，金克木于暑期返回北平，作长期译书打算。“沈仲章拿来秦斯的另一本书《时空旅行》，说是一个基金会在找人译，他要下来给我试试。接下去还有一本《光的世界》，不愁没原料。他在西山脚下住过，房东是一位孤身老太太，可以介绍我去住，由老人给我做饭。我照他设计的做，交卷了，他代我领稿费。教数学的崔明奇拿来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大众数学》，说他可以帮助我边学边译。我的计划，半年译书，半年读书兼旅游，就要实现了，好不开心。”（《译匠天缘》）世事岂由人算，“《时空旅行》译出交稿，正是抗战开始前夕，连稿子也不知何处去了”。（《遗德》）因此，并非戴望舒把金克木从天上拉到了人间，而是“日本军阀的侵略炮火和炸弹粉碎了我的迷梦。从此我告别了天文，再也不能夜观天象了”（《译匠天缘》）。

“七七事变”之后，金克木搭末班车离开北平，从此“奔走各地谋生。在香港这样的城市里自然无法观天，即使在湘西乡下也不能夜里一个人在空地上徘徊”（《译匠天缘》）。直到1941年，金克木乘船经缅甸去印度，才又一次凝视星空：“我乘船经过孟加拉湾时，在高层甲板边上扶栏听一位英国老太太对我絮絮叨叨，忽见南天的半人马座、南鱼座、南十字座一一显现，在地平线上毫无阻碍，在海阔天空中分外明亮。”（《记一颗人世流星——侯硕之》）此去经年，虽然印度的天空不同于中国，但星空仍不可望：“城市里只能见到破碎的天的空隙。在鹿野苑，是乡下，没有电灯，黑夜里毒蛇游走，豺狼嚎叫，我不敢出门。在浦那郊区，不远处有英国军队基地，又是战时，怎么能夜间到野外乱走？悬想星空，惟有叹息。”（《译匠天缘》）

# 老县城

李成

童年和少年时代，县城在我心目中是一座古朴的小城。除了没有城墙——那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时被拆除了的，为了敌机轰炸时，方便群众疏散；街道也只有四五条；一两条长些的，两三条短的，大多弯弯绕绕。它所有的也就是水泥砖房、小楼，中间有一座广场，街旁有一些商店、机关而已。但毫无疑问，它是全县人向往的中心。十里八乡要处理一些大的事务，买比较贵重的物品，都得来这里。

我家所在的村庄离县城大概有十三华里，这样的距离，以当年的交通方式，不算近，但说不上远。我们不能轻易就上县城一趟，但稍稍下个决心，付出一些努力，去逛一趟也并不难，不会像远在深山，或相距百余里地的远乡的村民，去一次县城便是大事。所以，我们一般从能记事起就对县城不陌生。

但我已经忘记自己何时第一次上县城了。最早的记忆是五六岁时，有一天晚上，半夜醒来，忽然睡不着了，辗转反侧。父亲被吵醒，问我怎么了，我无言以答，只好信口胡诌，说我不舒服。父亲摸摸我的额头，对我说，嗯，孩子是有点头发烧，明天带他去县医院看看吧。第二天，他果然把我直架在肩上，驮到了县城，穿越街巷，直奔地处县城西北隅、相对偏僻的县医院，当然没发现什么异常。我的父亲为我白累了一回。

后来去县城的次数不断增多。六七岁时随父亲去澡堂洗澡，上学以后，每年随同学、老师去烈士陵园扫墓。有几次跟着父亲到南大街吃馄饨，从街边店铺里买好木牌，却要到对街的铺子里端食品，总觉得有些奇怪，而那馄饨也着实圆滑可口。偶尔还随父亲及其同事到电影院看电影，记得最初看的是《钢铁战士》，印象中有被捕的战士面对敌人的拷打坚贞不屈的画面，后来重看此片，却没有看到这样的镜头，因此有些疑惑。每次去县城都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在麻石铺的巷道上颠簸，两侧古色古香的房屋曾引起我的好奇心，可惜一闪而过，看不真切。印象最深的还是离城门口不远的“小猪集”，一个卖猪的地方竟然也有两层楼，从窗洞里可以影影绰绰看到人们交易的场景；离此不远，竖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模仿领袖手迹书写着七律《送瘟神》。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这里放这么一块牌子，后来才恍然大悟：乡亲们不是对猪瘟常犯猪瘟感到头痛么？那么就以此首伟大的诗篇镇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知道县城里有家新华书店，为之魂牵梦萦，心心念念。十岁那年，借口帮对门的堂二姑爷拉一板车稻谷去县城里交公粮，完事后，路过书店那条街，便央求他给我几分钟时间，我去看下来；于是快速地跑进去，趴在那一排玻璃柜上紧张地搜索起来，在跟着进来的二姑爷的催促下，匆匆选择了一本能买得起的小册子：《陈玉成》，欢天喜地地回去。太平天国的一段历史便在我眼前展开，一个青年英雄的形象引起我这个少年的景慕。往后只要有空，总要进这家书店去流连一番。

每次从街巷上经过，对街上的居民常不自禁打量，总在想象不需要种地的他们，各自何以为生。其时，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家就在县城，我跟随父亲去过几次。跨过逼仄的巷子，和古旧的房舍，进入他的家，住室很局促，但室内挂着古画，家人的一切做派似乎都与我们乡下人两样，看得出生活的相对充裕。我后来怀疑这位姓方的老师可能出身本县有名的大家望族“桂林方”或“猎户方”，这两个家族在明清都出过很大的文人的，可惜老师已去世，无从问起。我还记得曾同我的另一位小学老师去访问过一位县级领导，他不过就住在一排砖砌平房，门前用竹子扎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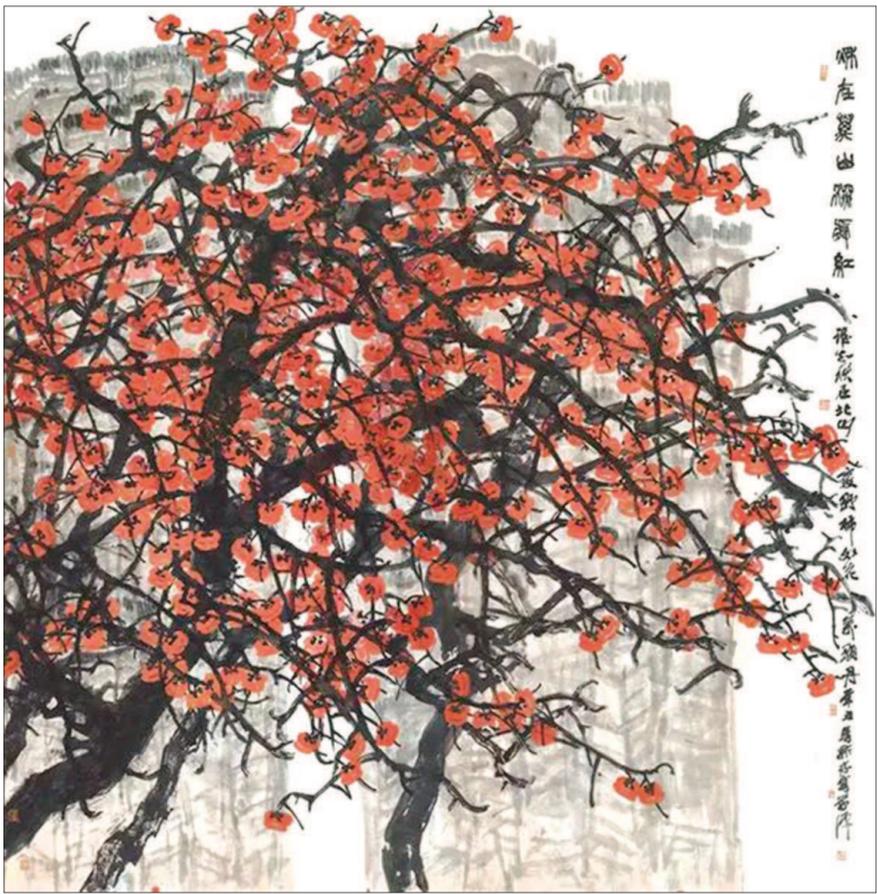
竹篱小院，室内布置朴素整洁。在一个夏日雨后，父亲与他的同事带我登上城北一座空空的碉楼式的建筑，那建筑仿佛有些摇摇欲坠的样子了；他们与一个我没见过的人从窗口俯看北城，一起在商议什么，我探头看着一条汹涌的河从城边流过。这些经历当然一闪即逝，事后就像梦一样渺不可寻。

不管怎么来去，县城对于我还是神秘的，我对它的感受总是那么有限。有一年外婆来我们家小住，父母决定趁此机会一起到县城照一张合影。怎么去的我忘记了，只记得到了县城我们是穿过北大街前往照相馆的。这样的偏僻街巷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想找个人打听一下方位也不容易，等了好一会，才见到一个戴红领巾的女孩，比我大一两岁的光景，她不仅热情地指示我们怎么走，而且给我们带了一截路。我还记得在那街巷一侧，是一片屋子拆弃留下的空地，这让我感到疑惑，怎么城里还有废墟呢？十年、二十年后，每经过这一带，我都把这个印象重新放映一次。

上了高中，因为学校在县城边上，终于可以和同学骑着车，在这座城里四处闯荡。到文化局文化馆去拜见文学老师、投稿；还曾跟家住在县城的同学一起从邮局边的一条巷子里曲折地穿过，到荣休院看电影——那里总放一些稀见的影片；夜里的灯光球场，可以看到一群人神龙活虎地打球……这一切都让我乐此不疲。新华书店去得更多了，有一次碰到书店降价处理书，一堆书摆在门口，都便宜至极，第一次遇上这样的事，简直令人狂喜，赶忙把《西洋漫记》《南行记》《南行记续篇》什么的，抱了一抱，满载而归。到了高考的前夕——预考，我还借宿在同学的住处，听着滴答的雨声，一宿未眠，一大早摇摇晃晃骑自行车去考场，竟侥幸过关。高考后一身轻松，又随同学住在他父亲的新单位——城关镇政府所在地。古雅的建筑，许多墙面都是木头做的，门窗大开大合，可谓雕梁画栋，非常气派。我心想这是哪个财主留下的房子，没有想到，后来公布它是一所名人故居！

本以为把县城探索得差不多了，但其实所了解的只是皮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县城里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名人故居，让我瞠目结舌。邮局边上那条常走的普通小巷，有一天封闭起来了，再经过一段时间去看，街巷整洁了，还在边上挂起了牌子，六尺巷，而且很快名动全国。原来的广场看起来比较开阔，在八十年代的某一天也圈起了一块地，盖起了一座仿古建筑：文庙。这一在六十年代以前曾经作为群众灵魂所寄的场所被声势浩大的孔圣人运动捣毁，现在又作为文化的象征物复活，且更气派，更光鲜亮丽。

时间似乎经过一个全新的轮回，城东那条河上两三百年前建筑的石桥，那巨大的石板竟然也被车轮磨出了那么深的辙痕，当年我每走过一回，都感到震惊，想象曾经有多少独轮车被人推着从这里走过，又有多少土子由此出发，北上京华博取功名。过这一切都消逝在历史的烟尘里，这座桥也因不堪重负被弃置，在它的一侧早已有一座新型水泥大桥飞架东西，每天车水马龙。县城则早已溢出了这条河界，向四面八方扩展了数公里。这样一个古文化发达之地，这里的人们素来不乏聪明智慧，只要不把他们的脚束缚起来，一任他们胼手胝足地干去，财富总可以成倍地积累。这些年城内的楼房也真如雨后天春笋，老县城俨然已蜕变成一座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城市了，令偶尔回乡的我简直找不到北。



秋在万山深处红（国画）马新林



# 林长民的文和字

陈学勇

林长民是民国初年政坛上一位明星政治家，致力“立宪”运动。身居北洋政府参议，两任众议院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能言善辩，办事干练，时人誉之“秘书长之理想人物”。一度入狱，为拒收要人的巨额贿款，拂袖离任司法总长。“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似与他也有关系。然而至今对他的研究尚不够多，原因之一，是他的文章不易觅得。我多年关注林长民，因而出版社约我编集她父亲的文稿，大概是“裙带”关系的一种。林长民从未出过书，如果不算那本《西力东侵史》（日译日文）。他的文章散布于上世纪初各种报刊，多数极不好找，蒐集谈何容易。然而这还是值得去做的事，再怎么不全他的文章，有多少算多少，集在一起，至少聊胜于无。勉力将《林长民集》书稿交出，里面很有一部分值得注目或令人愉悦的文字。几年来未见出版社动静，可能有观念、效益等方面的顾虑。我一直无意催问，或许还暗自庆幸。心里本来就虚，未得入集的文章，单说知道题目的数量已经不少。拖拖吧。

近日便拖到了短短的两则，均录自泰戈尔书写给梅兰芳的团扇（如图）。梁启超等以“讲学社”名义邀请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一路随行，并充任翻译，此是一九二四年春北京文化界一大盛事。其时梅兰芳已名声鹊起，异邦大文豪观赏了中国明星展示的风采，第二天又款款晤谈，团扇便落下墨宝。最珍贵的是，泰戈尔亲笔用孟加拉文、英文两体书写同一首小诗。林长民为诗翁撰志，亦可谓不平常。扇面上林文，其一



我拟题“志泰戈尔书赠梅兰芳诗”：竺诗人观剧之翌日与梅郎晤语，极称美梅郎扮演、描写之工。间以音乐歌唱如何，则曰：“如外国莅吾印土之人，初食芒果，不敢云知味也。”诗人极盼梅郎游印，以其艺术一响印人。汝障面兮予所欣，障以予所未解之语言若峰峦，予望如云蔽于水雾之濛濛。甲子四月既望，梅郎晚华为天竺诗人泰戈尔演歌剧《洛神》，诗人极为叹赏，以其诗句书班歌里，英吉利两文赠晚华。略译其旨如右，惜不叶耳。长民识。（铃章：阳文“长民”）林长民即时实录晤谈内容，不失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一瞬。林的译文用骚体，相当别致。以骚体翻译外国诗歌相当少见，记得只见过鲁迅译海涅的两首，他自己没有发表，录在周作人文集《艺文杂志》里。其二，我拟题“释泰戈尔汉名”：泰戈尔先生来华，得汉字姓名。梁任公为之取姓竺，名曰震旦。以其国为氏，以吾国名之也。外人来吾中土，

以国为姓之例甚多，泰谷尔名字别有意义。曰日，曰雷，与震旦两字同解。而吾华之名震旦，又从印度之称谓，今特以界印度之诗人，适与其本来名字之义相符，可谓称矣。诗人既得汉名，欲习汉书，先试毛笔书此团扇，可宝也。长民再志。（铃章：阴文“宗孟”）“宗孟”系林长民的字。讲学社赠汉名泰戈尔逸事，坊间传闻久远，其源即在此。作为实证的团扇藏北京梅兰芳纪念馆。

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从政之余往往别有建树，林长民以书法家著称。团扇这两则短文亲笔，亦可视为书法作品。梅兰芳招待泰戈尔的戏是《洛神》，因而林长民特又在团扇另一面抄录了曹植《洛神赋》，末具落款：“甲子四月二十日，既译竺诗人诗，并录于建《洛神赋》以贻晚华，亦以答盛意也。长民（铃章：阴文“林长民”）”。这可是一件真正正规的书法作品，一丝不苟。林长民传世书法作品多行楷，且每件字数有限。如此工整小楷，且一幅多达数百字，研究林长民的书法，必不可忽略这个特例。

林长民字好，加上他那身份，素求墨宝的人上上下下甚多。胡适说，林长民背时的日子曾经鬻字。我疑其故作姿态，并非为的生计。当下网上仍有林长民墨迹拍卖，难保其中没有赝品。看网上流传的“林长民书法作品”，或条幅或扇面，几无一不伪，她从不以“书法”示人，几乎一生只用硬笔书写。书梅兰芳团扇后一年，林长民遭军阀乱枪殒命。景仰他的戏剧家宋春舫，搜罗林长民书赠八方的条幅，编集一本《林长民遗墨》面世。第一幅字匾额《春湖庐》，一九二二年春应宋春舫所求。此庐乃宋春舫和朱闰生合建于西湖边别墅，因房子，因匾额，已是湖边一处胜地。《遗墨》收入几页未书台头的对联，大概就是鬻字时售品。现在这本《遗墨》十分稀罕了，各大图书馆难觅一册。

看林长民略早时候写给女儿的家书，书艺不及他人人生最后几年的炉火纯青，对照欣赏也蛮有意思。现今所能寓目的林长民字，条幅居多，我更偏好他随手随性的家书、日记，它们不像条幅庄重端正。我曾选取一幅他后期的家书用作拙著插页，喜欢它娟秀而兼道劲。林长民携林徽因旅欧数月，洋日记两万有余，全本用毛笔书写，洋洋洒洒，尤其见出神采、个性，实在是他书法的精品。这部日记林氏后人曾复印多份，各自存念。我有幸从林长民幼子林昭处再复印到一份，并将其文本以《欧游日记》辑入《林长民集》。始终未见日记墨迹披露于世，百年沧桑，要是它湮没世间，就太可惜了。



「文汇报笔会」  
微信公众号